

十年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张 宛 丽

中国社会学在被埋没了约26年之后，终于在1978年底获得了新生之机。短短十年，它以“民意调查”的独特优势，搅动了社会决策系统；以“定量研究”的体系特色，坚实地立足于—场社会大变革的现实之中。它开始以整体透视、系统分析、动态考察、实地研究的理论之光，在社会科学之林，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传统“重头学科”平分秋色。然而，在改革大潮中，哲学以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撞开了开放、改革的时代大门；历史学以其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鸣奏出了科学理性的社会号角；经济学以其对“所有制”的反思，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一页；而我们的社会学却还没有能够以其独特的学科参与能力，奉献出重大的社会作为。自然，恢复社会学研究不过才十年，不对它的“幼稚”过于苛求，况且它毕竟是一门科学，仅以“社会参与”的功利去衡之，也欠公允。正因其为幼稚，作为—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才更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其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轨迹。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反思

“理论研究”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未经严密论证的、不明确的，它可以指“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也可以指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分、界定之类非本文所为，在此假借“模糊性”原则，含上述二者之义，对十年来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做—番探讨。

十年来，理论研究主要涉及有八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及对西方社会学的态度）

就—般认识原则而言，借鉴、扬弃的方针是得到认同的，^①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怎样认识和把握西方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其实质是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特定文化的认同问题。—种意见认为，西方社会学的合理内核主要在它的经验部分，如社会调查方法、技术和理论，社区理论、科层制理论、核心家庭理论等—些局部理论，可为我们参考。^②另—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社会自有其特点，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在外国社会学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生搬硬套，有可能削足适履，是行不通的。^③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工具是

^①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② 同^①。

^③ 李庆云：《学会工作的近期回顾与展望》。

西方特定社会生活的认识抽象，原样照搬，用以解释我国的社会生活是不科学的，很可能产生认识偏差。^①

如果进一步深究，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牵涉到这样一些学术关系：一是学科和学派的关系。西方社会学有孔德、马克思各为鼻祖之说，二者的社会学思想各为一路也是公认的。从社会学本土化的角度谈论西方社会学，势必要遇到两个问题，即是指包容二者在内的全部西方社会学学科整体，还是从学派角度区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孔德一系的某一学派的社会学？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是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上，还是植根于中国的现代化文化？而现代化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于此，有人提出了独到见解，即“社会学的中国化，就是建立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体现中国现态文化民族主体性特色、反映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社会学体系。”^②在这一认识中，包含着将“社会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转换为建立“本土社会学”的思想。

二、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在1982年及1986年便有人先后将当时的不同认识作过综述，主要有五种观点。^③

一是指导论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坚持指导论的思想前提下，有人又特别指出，“社会学又是独立的学科”，二者“在内容上不要截然分开，要允许部分重叠。”^④“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理论升华，而社会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⑤“唯物史观是哲学，它包括一系列的原理、观点、范畴和概念。它们对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都具有指导作用。”^⑥

二是继承论的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并使之学科化。

三是兼容论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社会哲学又是社会学。

四是时代论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最高成就，前者为后者创造了“历史可能性”，而新的社会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则是后者产生的“决定性要素”。二者是人类对社会进行定性认识和定量认识这两个层次在理论上的总结，社会学研究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全面展开和深化。^⑦

五是层次论的观点，认为从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出发，唯物史观学说的基本内容属于普通社会学第一层次理论。从研究目的看，都是“为了揭示适用于人类一切社会的最普遍的整体发展规律，并也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回答。”所

① 参见叶小文：《社会结构分析中的几种社会学角度和概念工具》，《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张绚丽：《浅议我国目前理论社会学研究遇到的三个问题》，《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校刊》，1986年第2期。

② 袁阳：《试论社会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1期。

③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④ 潘允康：《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⑤ 陈树德：《对社会学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5期。

⑥ 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思路》，《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⑦ 参见时宪民：《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4期。

不同的是，“唯物史观学说是普通社会学第一层次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①

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一直困扰着我国社会学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中，是一种理论现象，且在有关学术探讨中，因其所具有的真理性和逐渐为其他学派所接受。然而在我国，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现象，其真理价值是和社会生活的划时代巨变紧密相联的，具有至关重要的社会实践性质。这也许就是一直困扰着我国社会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假若将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学派思想，可能会大大减少我们在理论社会学研究中遇到的困惑；而另一方面，面对其社会实践性质，试用包括这一理论在内的不同理论，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趋势，我们有可能彻底地科学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价值。

三、关于社会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社会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近几年逐步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追究这一关系与创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有着一定的联系。于此，可归为三类认识：^②

一是从学科角度分析相互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第二种看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学科名称而是一个学说名称，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对象的一种综合性专题研究，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主要属于政治学，而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主要属于社会学；若除去政治学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则属于形态社会学的理论范畴。

二是从研究领域的角度分析，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确认二者的研究领域的一致性，区别二者不同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层次，并认为二者分别为两个学科，是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交叉性。^③第二种看法明确指出二者研究领域不同，社会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分属于不同层次的三门学科；历史唯物主义属于最高(或最基础的)层次，于此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学则同时接受这两种理论的指导。^④

三是“中间理论”说，认为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中间理论”，它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协调发展理论原则及指标体系，为科学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克服弊端的参考系数。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问题，在我国社会学界的争论与在西方社会学界的有关探讨是有区别的。在我们这里关注这一问题自然是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社会背景分不开，而在西方同行那里，这一问题不具有社会实践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从来没有象在中国这样结出民族社会实践之果)，基于一种“价值中立”的理性态度，或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这两点构成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

① 陈烽：《社会学——对社会作整体性研究的科学》，《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③ 郑抗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④ 陈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关注。当然，近十年来，随着国内有关学术活动的深入发展，出现了视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一种行动指南，而且为一门科学的“理性态度”的萌芽，从而使有关的争论具有了新的意义。

十年来，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两种倾向性态度及认识：^①

一是持肯定态度的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具有社会学学术传统。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定社会形态的整体及其各个方面所作的综合考察及其理论成果中，从其对社会现象的考察所使用的独特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中，都可以看到其在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上所具有的社会学性质。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未使用或极少使用“社会学”一词而否定其社会学的学术性。^②有的同志则从西方社会学发展史的角度，肯定指出马克思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不仅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原理，还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学的一系列范畴、概念。”^③还有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做了系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学思想，而且自成体系，形成了与其它社会学派所不同的鲜明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过程，以现实的人为其分析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其基本的社会分析模型，以唯物史观为其主要的社会分析工具，以人与社会和自然及其关系为其社会分析对象，构成了其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基本思路。”^④

另一种是持区别态度的认识，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包含有大量的科学社会学思想，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未使用过“社会学”这一名称，也没有提出过建立一门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能代替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研究。

上述不同的认识，实际上涉及到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及方法论的认识问题。如果认为以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学的基本属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显然以其所具有的批判性、革命性而难以在逻辑上得到社会学的认同。如果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那么便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以把握社会进程所具有的整体性、宏观性和系统性对于社会学的理论贡献是独树一帜的。

五、关于毛泽东思想与社会学

对此问题基本上也是两种倾向，即一种是充分肯定并论证了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并指出其特点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出全面分析的社会学。^⑤另一种认识则强调毛泽东社会思想与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原则区别，并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放到了关系革命和建设全局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上，而不是放在某些具体学科的建设上。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家。”^⑥

六、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近十年来最热烈也是最具歧义之

^①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② 参见张向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辨析》，《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4期。

^③ 吴铎：《马克思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社会学通讯》，1983年第1期。

^④ 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⑤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⑥ 同上。

争的。这些不同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种：①

1.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于此主张者还有一些差异，即一是主张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研究社会结构、功能及发展规律。② 另一主张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规律。③ 还有的以社会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社会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等。④

2.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协调发展的条件和规律的。对此又有几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应研究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⑤ 有的则认为应以社会整体化过程和社会各层次中各个侧面相互协调而构成的整体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⑥ 还有的认为应研究各个社会形态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社会总体结构的协调发展的条件等。

3.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及其相互联系。有的直接界定为“社会现象关系学”，指出社会学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动态关系；⑦ 有的则强调一方面是研究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综合研究某一社会现象，并提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是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空白点”及“跨学科”的研究。⑧

4. 社会学应研究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与其它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认识中，研究者将社会生活解释为除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外的人类生活，分为三个方面，即劳动生活、婚姻、恋爱及家庭生活、闲暇生活。⑨

5. 社会学研究一定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包括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性质及分类；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构与变动；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寻求一定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⑩

6. 社会学研究社会的整体发展规律。一种观点认为“普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的基本构成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它的任务是揭示社会整体发展的规律。”这一认识将“社会整体”解释为三类，即一般社会整体（如“人类社会”）、特殊社会整体（如社会主义社会）及个别社会整体（如中国社会主义社会）。⑪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关状态与管理协调的机制。”其对“社会整体”的解释包括三个内容：“一是纵向社会整体，即相对独立的各种社会活动领域；二是横向社会整体，即相对独立的各种社会共同体；三是总合社会整体，即一定地理范围内各种社会活动领域的

①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② 参见《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5页。

③ 孙立平：《论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及目前面临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1期。

④ 雷洪、范洪：《社会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7页。

⑤ 参见郑抗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68页。

⑥ 参见袁亚愚、曹一之：《社会学——历史、理论、方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

⑦ 参见崔树义：《社会学：社会现象关系学——社会学研究对象之我见》，《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4期。

⑧ 张乐宁：《论社会学的性质及其研究对象》，载《社会学研究与政务决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

⑨ 参见陈树德：《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的若干观点——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载《社会科学评论》（简报），1986年第11期。

⑩ 参见刘祖云：《试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版）》，1985年第3期。

⑪ 陈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系统。”^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从变动的社会整体出发，以多种角度和多种层次综合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社会整体的形式、模式、组成、构成、运动和规律，及社会各方面（或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之间相互性的科学。”^②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社会学不是或不可能是研究社会整体的，主要理由是：社会整体框架通常就是社会经济形态，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社会学不同于社会哲学，社会学不可能包容意指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社会整体这一广阔而丰富的研究领域。社会学不是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如果把社会整体研究归结为综合分析，那么这仅仅是一种方法，不能构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将社会学降低为一种方法。^③

7. 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因为社会学是综合地研究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是由人们的社会性行为造成的。”^④

8. 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这一认识是在赞同《辞海》中社会学辞条有关界定的基础上发展的。^⑤ 与此认识接近的另一种观点是：“所谓社会学，简要地说，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系统理论，关于人类社会的系统学说，关于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综合性的具体科学。”^⑥

9. 社会学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及其形式。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社会学应该着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和固定化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要研究个人的一定的行为怎样形成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怎样形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⑦

10.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社会学除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外，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一。”^⑧

11. 也有的认为生活方式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⑨ 有人认为社会学是研究模糊社会现象的。^⑩ 还有的认为社会学研究“人——社会”的双向运动的机制及其发展规律。

七、关于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主要是指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及其结构层次，还有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及具体理论。

1. 关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及其结构层次。对此主要有四种认识：^⑪

① 宋林飞：《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

② 雷洪、范洪：《试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5期。

③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④ 杨心恒、宋力：《社会学概论》，群众出版社，1986年8月。

⑤ 陈树德：《评〈社会学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的若干观点——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1期。

⑥ 彭立荣、王训礼：《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济宁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2期。

⑦ 庞树奇、蒋雅容：《社会学概论》，上海大学文学院（校内用书），1986年2月，第31—32页。

⑧ 雷洁琼：《有关社会学的几点意见》，《上海社联通讯》，1980年增刊第12期。

⑨ 同③。

⑩ 同③。

⑪ 同③。

一是“两部分”的结构认识。许多人认为社会学应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部分。前者是对社会总体进行理论研究，亦称宏观社会学，包括一般理论和专门理论；后者是研究个别的、具体的社会现象并解决实际问题，亦称微观社会学，包括研究方法和应用研究；两部分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具有内在联系；既具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又有共同的方法论和理论联系。另有一种“两部分”的结构认识认为，一部分是关于社会整体的总体模式、组成、构成、规律——称之本体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社会的各种分体的模式、构成、规律——称之专门理论。^①

二是“统一性”的认识，认为将社会学划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部分不妥当。应用性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包含了理论与应用的统一。

三是“层次性”的认识，认为研究社会整体的普通社会学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研究一切社会形态的整体发展一般规律的“一般社会学”；研究某种社会形态的整体发展特殊规律的“特殊社会学”，或称为“形态社会学”（如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某一特定社会的整体发展个别规律的“个别社会学”（如“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学”）。在这三个基本研究层次之间，存在着从个别上升到特殊，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以及一般指导特殊、个别的双向关系。^②此外，另一种划分三个层次的认识是：第一层次，研究社会总体结构的总论；第二层次，研究社会分体的部门社会学分论；第三层次，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调查专论。

四是“主线论”的认识，这主要是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时提出来的，即这条主线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社会管理、社会发展依以运转的轴心；而人民内部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人民内部矛盾即是这条主线。^③

2. 关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

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亦指社会学最高层次的理论。于此主要有三种认识。^④其一，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展开形式，它构成为特殊形态的社会规律，即社会主义社会学规律。其二，认为唯物史观和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变迁的理论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第三种认识指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应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具有特殊性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及其展开。

3. 关于社会学的具体理论

社会学的具体理论泛指社会学非最高层次的理论，如分析社会学、部门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实用社会学等等。^⑤何为专门理论？于此有三种认识。

一种认识是从应用社会学与部门社会学的关系入手的。这种认识认为二者都是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主旨，内容上有交错、重叠，可以合称为“实用社会学”或“实践社会学”；二者的区别是，应用社会学是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应用，而部门社会学则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社会某一方面的现象的社会学具体知识和理论。

① 雷洪、范洪：《试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5期。

② 陈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③ 高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初探》，《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④ 参见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⑤ 同④。

另一种认识是从研究对象及理论层次入手,得出结论认为应用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其研究对象的层次低于理论社会学,因而它既是微观社会学,又是分支社会学。

第三种认识是从社会主义形态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发展规律及其表现特征的理论是社会学的专门理论。

此外,有人注意到了有关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两点:一是首先应科学界定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宏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等等概念;二是遵循“学科理论自身的逻辑规定性,例如同一律、层次性、科属关系、归纳和演绎等。”^①

八、关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

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一定的模糊性,这是和其学科性质分不开的。从理论上讲,怎样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应当得出怎样的社会学特点的认识。

关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主要有以下六种认识。^②

一是两性论。认为现实性和相关性是社会学的两大特点。

二是八性论。认为社会学具有理论性——它揭示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律;具有应用性——可以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具有阶级性——它为不同阶级服务;具有群众性——它面对所有的人;具有地区性——反映地域社会的特点;具有民族性——体现民族特征;具有国际性——各国社会学界之间都建立联系并进行比较研究;具有时代性——变迁、发展的观点。

三是五特点论。第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第二个特点是广泛地研究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第三个特点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综合性;第四个特点是坚持把社会这个整体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现象,放在运动和变化中进行研究;第五个特点是非常注重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③

四是三特点论。第一个特点是其“发展历史短,自身变化大”。从纵的方面看,现代社会学同孔德社会学相比已面目全非,从横的方面看,各国社会学不统一,学派差异很大;第二个特点是“研究范围广,具有综合性”;第三个特点是“结合现实紧,具有敏感性”。

五是六特点论。第一,对社会的主体——人的研究最全面;第二,把社会作为整体,进行多种因素、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第三,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运用某些自然科学方法以至某些现代技术手段;第四,能与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相联系,共同研究社会;第五,信息灵通、反应敏捷;第六,具有研究社会问题的专门理论和方法,能对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解释,提出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措施。^④

六是在着眼于社会学发展史,充分肯定社会学的时代性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的三个理论特点:“它不等同于纯粹的实证的枝节分析和经验研究,但又必须以这种研究作为理论的依据;它也不是作为哲学对社会本质及其规律的抽象描述的理论延伸,但又必须以对社会的科学准确的定性结论为理论上的逻辑指导;它通过建立科学的社会研究理论模型,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共性提出科学的理论假设,对社会的发展进行精确的理论预测,从而建立一个科学的

① 雷洪、范洪:《我国社会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② 同①。

③ 参见编写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

④ 同①。

社会研究网络。”^①

七是四性论的认识。“社会学的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整体性、动态性、现实性和综合性。”整体性——社会学把人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动态性——从人的行为活动和社会运行过程上分析、描述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现实性——注重对社会现实的研究；综合性——对人和社会等，进行多种有关因素的考察，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②

以上对十年来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做了一个粗略的综述。依笔者所见，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是在由浅入深地发展着，它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同时又生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的社会氛围中，以致于在有关研究中，传统的思辨色彩使社会学的研究特色产生了某种“中国化”的变异。例如，一方面在概念上兜圈子，经常处于“务虚”状态。如果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已具有了相当雄厚的经验研究资本，或者学者们都对理论逻辑驾轻驭熟，具有一种理性自觉，那么这种“务虚”将可能导致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上获得令人振奋的学术成就，然而不尽人意的现实告诉我们，“务虚”的结果远非这样理想。无怪乎外域人发出如此这般的惊叹：“自一九七九年重新讲授社会学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弄清这个学科的界限，目前仍在讨论社会学的范围以及社会学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最近，‘发展’这个概念在中国成了热门话题。这个领域里的许多学者就各种理论争论得不可开交，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建立一套关于中国发展情况的可衡量的指数。”^③当然，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如“发展”指标问题，现在已有人在做深入研究，但这不过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且还未形成一种群体行为。这是“中国化”变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变异却令人鼓舞，毕竟中国人的综合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思辨因素并非一无是处。因为社会学的理论特色之一便是其整体视角及综合功能，而其在今后的发展，又面临着哲学意义的宏观体系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理性态度，能够把握住理论逻辑准则，能够搞清楚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构架，那么，传统思维方式带给我们的则可能是建构社会学宏观理论体系的独特优势。在同仁的一些有关的理论质疑中，这种变异的优势已经显露了出来。

由于社会学根源于西方文化，自1978年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我们又不得不首先通过引进当代西方社会学，在借鉴、扬弃的过程中创建当代中国社会学。从这种背景因素上分析，十年来经历的由学习、借鉴、再到扬弃的过程，难免不产生学习者的“模仿效应”，即囫囵吞枣而难得自觉。随着不断地学习、借鉴过程，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学发展史的系统研究，使我们越来越有可能摆脱“模仿效应”之囿，逐渐步入独特的理论研究之道。

回顾这一过程，有一种现象引人深思。西方社会学在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种理论模型，不同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及思维特性，使这些理论模型各具特色。探寻这些社会学理论各自不同的历史根源，联系到我们引进、借鉴过程的一些客观倾向，似乎出现了一种矛盾。按照一般的逻辑，引进、借鉴外来文化及理论，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与本民族文化特性接近、对路的理论，一种是相背于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反路的理论；从引进者一方来说，如果外来理论的真理性及本民族的相应条件兼备，那么上述任何一种方式都

① 时宪民：《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4期。

② 奚从清、沈康方：《社会学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

③ 《香港虎报》，1989年3月26日。

可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引进者的把握能力。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根源看,有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实证主义、德国的历史主义及美国的实用主义等。^① 如果按照“对路”原则做一番社会学理论引进及借鉴,那么应当对源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社会学模型及其理论成果(如韦伯的社会学思想)表现出浓厚的理论兴趣。当然,在学术界包括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韦伯热”,但是与近十年美国社会学对我们的影响相比则非主流。另一方面,在引进、借鉴美国社会学的初期,我们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方法兴趣而非理论兴趣。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学习美国社会学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中美社会学初期交流的主要内容。”^② 出现这种现象,也许和下述原因有关:初期,对当代社会学的特点具有近似于定量研究的肤浅理解;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本身显示出的科学性优势;活跃的中美文化交流带来的便利条件;老一辈社会学家与美国社会学界较为广泛的联系;美国当代社会学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独特关系等等。上述两方面的现象也许是“模仿效应”所必然具有的盲目性的反应,或许是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从当代西方文化中寻找建设现代化新文化理论武器的文化探索有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具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乐观主义特征的美国社会学与具有历史主义、强调文化独特性的德国社会学,甚至具有实证主义传统的法国社会学及功利主义倾向的英国社会学,在我们这个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转型期的社会生活中,都有其现实土壤,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都有可能嫁接出独特的理论之果,也就是说在我们走过了一段引进、借鉴之路后,社会学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多元化的探索局面。

此外,十年来,关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讨论得不够充分,也是令人深省的一种现象。如果说我们擅长于理论“务虚”及整体思维,那么是绝不应忽略方法论方面的探讨的。然而,热衷于一些概念之争而冷落了“方法论”的实际情形,与理应重视“方法论”的逻辑结果恰恰相反,表现出了类似于“丢了西瓜而拣芝麻”的悖论行为。或许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客观上仍应归于“模仿效应”的盲目性上,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我们自身在理论修养方面的“先天不足”。若追究其深层原因,也许又要推论到老祖宗的经验理性与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的差异上去。喜欢“刨根问底”,也许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经验理性的遗产,也许导致了我们的“丢了西瓜拣芝麻”的悖论行为,但是也许在一旦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之时,又生成了强烈的反思欲及批判精神,并且成为通向科学理性的行为动力。这些“也许”,并非仅仅是一些理论假设,在最近两、三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在一些同仁的研究活动中,已经有所实践。1988年8月在伊春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及198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讨会”,关于社会学研究中“价值无涉”(value free)^③ 原则的争论,已经反映出了一种追求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倾向,而在有关的社会学理论中,已经反映出了一种追求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倾向,出现了坚持理性原则的学派倾向。当然,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并未因其具有的科学理性传统而逃脱悖论行为——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宏观理论至今未能站立起来,这无异于说明经验理性与科学理性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掣肘之处,二者之间也许通过“杂交”,方有可能取得

① 参见〔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译本,1988年2月,第29—36页。

② 邓方:《中美社会学的十年交流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③ “价值无涉”系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观点。主张此说者认为,在从事社会学研究时,研究者应尽量避免价值评价,保持“价值中立”,以避免由于研究者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导致研究偏见。

重大的社会学的理论突破。

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及其反思

论及社会学的方法问题，首先便遇到方法论的问题。方法论既属于理论研究范畴，又可以归入于方法系统。为方便起见，在此权将方法论包括到方法研究部分中。

一、关于方法论的研究

如前所述，我们关于方法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如对西方社会学主要存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人文主义方法论，我们有何认识？在创建当代中国社会学时，我们的方法论是怎样性质的？它与多元化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方法论与西方社会学两大方法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很多，如有唯物辩证方法论、理论逻辑方法论，更重要的是创立了唯物史观方法论，从而克服了西方社会学两大社会分析方法论的缺陷，“使社会历史分析和功能分析构成了互为条件的统一体，使人们既能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把握社会中互为条件的因素和进程所构成的体系，又能通过对社会功能的分析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①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方法的第一个层次”，并提出了六个观点和范畴：物质第一性观点；社会现象具有规律性；社会是矛盾的统一体；社会现象之间具有普遍联系、互相制约及作用；运动变化的观点；社会现象中的质与量的关系；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性。^②

有人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不同于前的五个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辩证法的观点，系统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及群众观点。^③

有人在研究并肯定了唯物辩证法、逻辑方法及系统方法的方法论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四项方法论原则：真实性原则，多向性原则，准确性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的原则，动态资料收集与静态资料收集相结合的原则，调查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量的解析与质的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横向考察与纵向考察相结合的原则，社会矛盾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相结合的原则，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原则，方法上的更新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④

有人认为构成科学方法论的是唯物辩证法（矛盾分析法）、历史辩证法（阶级分析法）、信息论、控制论及系统论。^⑤

有人在界定了何为方法论之后提出，“社会调查的方法论是由不同层次、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主要是指各种专门社会学理论在社会调查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逻辑方法论，

① 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思路》，《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戴建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

③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

④ 于真、许德琦：《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科学方法与技术》，工人出版社，1986年12月。

⑤ 严家明：《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2月。

是科学研究具体方法和技术的一般理论或学说。^①

二、关于社会学的方法体系

关于社会学的方法体系，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认识认为，“方法体系的主要特点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为基础，以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为指导，以辩证逻辑为思维方法，并且不断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体系主要是由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社会调查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社会调查研究的具体技术和工具等三大层次构成。”并认为三大层次之间及每个层次内部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②

另一种认识认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是带有根本性的哲学基础，“第二个层次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技术和工具。”^③

还有一种认识将方法体系解释为：方法论、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调查研究方法系统、技术工具系统等的方法科学。^④

第四种认识认为社会调查学研究的方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是最高层次的方法，包括最一般的哲学方法和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是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它是中间层次的方法，包括调查材料的方法和研究材料的方法；三是社会调查的程序和各种具体方法，它是最低层次的方法，包括社会调查的一般步骤和使用调研工具的各种方法。”^⑤

此外，有人提出了建立社会调研学的设想，并认为：“方法科学，或方法学，是各门学科方法逐步丰富起来后必然要出现的。从体系上它有四部分。即（1）自然科学方法（自然辩证法是它的核心部分）；（2）技术科学方法；（3）社会学方法；（4）思维科学方法。四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社会调研学就是社会领域内的方法学。”^⑥关于社会调研学的理论框架，亦分为4个层次：（1）哲学基础；（2）方法论层次；（3）方法层次；（4）技术、手段、工具的层次。

关于社会学的方法体系，尽管有上述不同的认识，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即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指导地位，都充分注意到了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与技术。

三、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的争论

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的争论，见诸于文字的很少，但在各种场合却不时地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问卷调查方法及有关问题上。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涉及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① 仇立平：《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同①。

③ 戴建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

④ 于真、许德琦等：《当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技术》，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

⑤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

⑥ 于真：《社会调查研究学科化议》，《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1. 问卷调查方法与社会现象复杂性的关系。

一种意见是充分肯定对社会现象可以使用问卷调查法做定量研究，并认为我们过去的一些决策失误，就是因为对社会现象没有以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定量研究为方法基础，结果导致了主观化的错误。

与此相反，另有一种意见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使用问卷调查法是很难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联系的，甚至很可能陷入主观性、表面性及机械性的泥潭。

还有一些同仁针对“问卷热”及仅仅依靠问卷调查便得出某一调查结论的现象指出，问卷法仅仅是社会学诸种调查研究方法之一；在大型的社会调查研究项目的调研实践中，还必须借助于访谈法、文献调查法、观察法等不同方法，否定“问卷法”和夸大“问卷法”都是不可取的。

2. 问卷调查法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10年来，问卷调查法从开始时的不被接受，到迅速传播，以至后来每搞调查必不可少，出现了“问卷热”，这期间，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似乎形成了一个公式：问卷调查=定量研究=科学研究。与此同时，定性研究的科学价值变得少有人问津了。然而，问卷调查法的产生背景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都市化社会生活，这意味着活跃的社会流动、较高的人口文化素质及语义认同能力、合法的有保障的隐私权等社会发展条件，而所有这些，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由此，有些人便提出了“问卷法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吗？”之疑问。他们认为，依中国现在的国情，不适合用问卷法，一是调查对象很难搞清楚问卷的语义；二是受“舆论一致”的习惯左右，虚假成分很大；三是没有法律保障合理的隐私权而难以合作。有人主张仍应走费孝通先生所实践的以区位法、访谈法为主，辅之以问卷法的路子。

固然，“不适合”自有其道理。但是，若从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分析，则可能得出与之不同的认识。依据这些学科的有关原理，人类对于外界的客观刺激，不是一个被动的受体，而是具有适应能力及创造性的行为主体。试想随着问卷调查的多次实践，被调查者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理解它并产生一种“自我改造”效应，这一点，已经在笔者的有关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当然，城市生活的职业者比农村生活的种田人，在接受能力及配合能力方面都要胜之一筹。因此，我以为，一定的社会条件加上一定的试验及实践，特别是调查研究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适当地使用问卷法是可行的，并且是有益的。再者，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发展的现实水平和问卷法产生时的城市化水平相差不大；而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及社会问题，具有近似于问卷法产生时的转型期的社会特点；我们的城市化发展也不可能脱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因此，问卷法在我们这里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及社会根据。

最后，有一点我认为我们以往注意不够而需今后认真研究的问题，即方法现象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方法是人们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又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特殊抽象物。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如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本世纪曾有两大学派，一个是芝加哥学派，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所创造的参与法、访谈法等，是随着当时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变动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展开社区实地研究及社会问题研究而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同样，作为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方法标志的社会统计法、问卷法等，也是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由城市社会问题转向个人行为问题并展开

市场研究而出现的。论及到我们的方法实践，就不能不考虑到具体方法赖以生存并发挥积极作用的社会条件，就不能不研究方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功能问题。再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西方社会学分层理论的方法为例，前者具有阶级冲突的理论背景，后者则是以阶级调和为其理论支撑。如果想在一项有关研究中同时借鉴这两种截然相反理论的研究方法，就应首先研究导致它们之间相互过渡的“接口理论”（如同在计算机技术研究中，不仅要分别研究软件与硬件技术，还要研究软、硬件的接口技术），否则，便很难避免认识结果上的逻辑矛盾，从而丧失科学性。

十年来，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已经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有人认为，十年来，各家的观点都“见了面”，在下一个十年的发展中，很可能在此基础上，出现学派活动及其成果。如果能够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争鸣，那么这一预言将可能成为现实，我们将会迎来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发展。

（1978—1988年国内作者社会学理论、方法著作附录略）

1988年4月于北京·月坛北小街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唐军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召开理论讨论会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于1989年3月10日，在市委党校举行了北京地区社会学理论讨论会。会议由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袁方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市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科研教学人员及实际工作者40多人。讨论会是在我国改革十年、社会学重建十年及北京市社会学第二届年会召开前的形势下举行的。会议突出了“对十年来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这个主题，从我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与普及、社会学对我国改革应起的作用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等3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郑杭生、韩明谟、陈传康、蔡文眉、宋书伟、孙殿义、王思斌、萧国亮、张静等十几位学者，围绕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讨论中坚持了“双百”方针，发扬了学术民主，心里有什么谈什么，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论，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讨论气氛异常活跃。“社会学要为改革服务”，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特点，也是会议的最大成就。同时，会议还为今年五月即将召开的北京社会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作了理论准备。袁方教授致了会议开幕词和作了会议总结。袁方教授在总结中指出：

第一，改革需要社会学，而社会学也只有积极投入到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去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学才能发展，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具有中国特色。

第二，要继续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多搞些学派，不搞宗派，求同存异，宽容大度，兼收并包，团结一致向前看。

第三，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要加强，方法要提高，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作出新贡献。

（颜伯伦）